

论羁縻府州制度与唐初边疆形势的关系

孙靖国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唐朝初年平定东突厥后,为利用突厥部族的战斗力,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周边形势,从而确立了羁縻府州制度。羁縻府州制度确立后,也的确为唐朝提供了兵源,解决了兵力不足的问题。

[关键词] 东突厥;羁縻府州制度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674(2008)03-0087-03

隋唐王朝终结了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战乱割据局面,重新建立起统一帝国,并着力开拓、经营边疆。与两汉边疆只有匈奴是组织严密的大国不同,唐帝国周边先后崛起多个强大政权,此衰彼盛。为维持“胡越一家”的庞大帝国,控制这些族群,唐朝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措施和战略重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羁縻府州制度,就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一、唐太宗安置东突厥余部政策的出发点

贞观四年(630),唐灭东突厥,在如何安置其降户的问题上,唐廷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227}各方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主张将突厥人迁入内地,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从事农耕,从而“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二是严守华夷之别,主张将突厥降众遣回河北(北河之北),任其自生自灭。第三种意见就是温彦博提出的,依照东汉初年故事,把突厥部落安置在河套地区。

从唐初的国势与周边形势角度来考虑,如果实施第一种意见,十万突厥人进入中原腹地地区,经济、文化和生活上的巨大转变势必会导致激烈的冲突^①,唐朝政府必须花大力气监控和管理。

如果实施第二种意见,把突厥人赶回草原,那么必然要派重兵把守边境,以防止突厥人重新壮大后再次侵犯中原。而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意见与客观形势也是相脱离的。在突厥最终破灭之前,以薛延陀为首的铁勒诸部已经完全控制了漠北,与唐朝建立了臣属的关系,如果将突厥余部迁回黄

河以北、大漠以南的地区,必将会引起大漠南北形势的变动,导致新的战争^{[1]239}。

这两种意见都必然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唐朝要派遣重兵,或监视内迁的突厥人,或出兵大漠,扶植突厥余部抵御薛延陀的兼并和驱赶;二是无论突厥人被汉化为农民,还是重新回到草原,唐朝都势必无法得到这支强悍的骑兵。

突厥人虽然被唐朝打败,但作为游牧民,本身就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唐建国前后,周边先后崛起多个组织严密的国家政权,唐太宗必须考虑多线作战的需要,而如果采用第三种意见,唐朝的军队既不会被牵制在北方边境,又能有效地利用突厥的军事力量。这种全盘战略考虑在隋代便已得到贯彻:大业三年四月,突厥启民可汗上表,请求“依大国服饰”,而隋炀帝“以为碛北未静,犹须征战”,希望突厥骑兵保持战斗力,而拒绝了启民可汗的要求^[2]。

对温彦博的主张进行补充和明确化的,是李大亮于贞观四年(630)提出的建议:“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3]卷92}。李大亮的陈述将羁縻制度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明确表达出来,也就是围绕保障“中国百姓”的利益这个中心,用“羁縻”的政策,使唐朝政府从突厥乃至所有周边族群处都能收到“实福”。

所以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将突厥余部安置到边疆的半农半牧地区,使其“不离本俗”,既保

①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载,颉利被唐朝俘虏后“郁郁不得志,与其家人或相对悲歌而泣。帝见羸惫,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麋鹿,纵其畋猎,庶不失物性”。可见唐廷很清楚突厥人不适应中原气候和生活方式。

持突厥人的部落组织和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又可以将这支强大骑兵收归唐政府所用,平时替唐捍翼北部边境,牵制薛延陀等铁勒势力的扩张,需要大规模用兵时又可以随时调集。

从这一方针出发,自贞观四年开始,由突厥降众开始,唐朝先后设立了近1000个羁縻府州^[4],构成唐帝国边境地区的主要组成形式。

二、东亚国际形势对羁縻制度确立的推动作用

以往研究羁縻制度确立的原因,多从中原政权自身的角度着眼,更多地强调单向的民族政策因素。但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唐朝周围环绕着多个组织严密,且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政权。这些族群、政权的对外经略活动常常会威胁唐帝国的天下秩序甚至国家安全,而唐朝受周边各族群、政权政治活动而被迫调整政策的事例也并不少见。王小甫指出:“透过高宝宁据营州事件及其前后中原王朝与东北诸族关系的变化,人们不难发现高句丽在东北地区政治活动中的主动性和进取性,这些特点过去由于过分强调中原王朝的作用而被忽视了或重视不够,从而影响了研究者对历史真相的认识”^[5]。

唐朝初年,积极对外经略的周边政权不止东突厥一家,消灭了东突厥决不是天下太平。在东北,据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分析,高句丽“肆意扩张,不听劝解,进而向辽西拓地”^[6];在北方,薛延陀逐渐强大起来,称雄漠北,对唐也越来越不恭顺;在西北,西突厥统领中亚广大地区,又控制着丝绸之路上的城郭诸国。这些强大国家,都是唐朝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天下秩序的重大障碍。而且,随着东突厥的瓦解,许多原来臣属于东突厥的族群独立并强大起来;随着唐统治地域的扩大,接触到的族群与政权越来越多,势必会越来越深入地卷进各地的事务中。比如吐谷浑本依附于东突厥,东突厥败亡后,吐谷浑逐渐强大起来,多次侵入唐河西地区。贞观八年,吐谷浑伏允可汗拘留唐朝鸿胪丞赵德楷,太宗遣使十余次竟无效,可见吐谷浑并不信服代东突厥而成为东亚大陆霸主的唐帝国的权威。于是唐出兵败降吐谷浑。^{[6]卷221}上又比如高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唐灭东突厥后,伊吾附唐,高昌王见已与唐接壤,于是亲至长安,促成唐与西域通道。吐谷浑与西突厥控制西域通道后,高昌依附西突厥,垄断西域商路,劫夺唐贡品。结果唐于贞观十四年灭高昌,设置安西都护,从此进入西域地区,遂与西突厥势力交错,争夺激烈。^{[6]卷221}上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既有唐廷主动向外经略的部分,但也与周边各政权向唐的权威挑战,企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格局有关,唐朝并非每次都是主动介入争端。唐政府要解决这些事务,往往不得不派兵征讨,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土和部族纳入自己的版

图,就必须要派遣越来越多的军队。

从自身的国力来看,隋末的大战乱给中原农耕地区造成极大破坏。贞观初年,魏征曾指出,从伊、洛以东,直至泰山,还是“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7],亟待休养生息。贞观二年彻底更改全国兵制之后,军人由职业兵变为亦兵亦民的预备兵,府兵平时要从事生产^[7],大规模征发会影响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唐朝虽然一举灭掉原来东亚地区霸主东突厥汗国,但主要是乘东突厥内部分裂,所属诸部纷纷自立,连年混战,又有严重灾害的机会,出奇兵突袭东突厥牙帐,一举建功,并以东亚大国身份震慑铁勒诸部,才得以收拾大漠残局,并非由于当时的唐帝国对大漠游牧民族存在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由于四处都有用兵的潜在需要,而能调动的常规军又是有限的。所以遇到大规模战争,兵力往往不敷使用。比如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太宗率大军亲征高句丽,亲征之前大行募兵,“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8],“召募十万”^{[8]卷3},可见府兵已不敷使用。

要补充兵力,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募兵,再一个就是征发归附的各族军队协助。在唐太宗时期,这两种办法都曾使用,尤其是调动归附各部族。下面列举其中的一些战役。

征讨吐谷浑:贞观八年(634)六月,“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将边兵及契苾、党项之众以击之”。同年十二月,“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诸军;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为鄯善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并突厥契苾之众击吐谷浑”^{[8]卷194}。

在征讨吐谷浑之役,突厥和党项都协从唐军作战,只是数量不甚了然。其中契苾部的军队在战争中起到了扭转战局的作用^①。

征讨高句丽:贞观十八年(644)七月,唐太宗“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8]卷197}。显然是以汉军率各归附部族作先锋。

在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句丽之前,针对北部和西北方向的威胁,部署军队进行了防御。“王师犹在辽,(薛延陀)因即寇边。帝遣江夏王(李)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万彻与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屯胜州,左武候大将军萨孤吴仁屯灵州,执失思力与突厥犄角塞下,虏知有备,乃去”^{[8]卷217下}。守边军队有汉军,也有突厥兵。

在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中,因为府兵不足,也因为

① 《新唐书》卷110 契苾何力传记载:(贞观)九年,与李大亮、薛万彻、万均讨吐谷浑于赤水川。万均率骑先进,为贼所包,兄弟皆中创堕马,步斗士死十七人。何力驰壮骑冒围奋击,虏披靡去。是时,吐谷浑王伏允在突沦川,何力欲袭之,万均愿前败,以为不可。何力曰:“贼无城郭,逐荐草美水以为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鸟惊鱼骇,后无以窥其巢穴”。乃阅精骑千余,直捣其牙,斩首数千级,获橐驼、马、牛、羊二十余万,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

薛延陀在北方的牵制,太宗调动了多个部族的军队。“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10]卷 197}。突厥系统的契苾何力^{[10]卷 95}、阿史那思摩^{[10]卷 194 上}和阿史那设尔^{[10]卷 198}也都加入了征讨的行列,此三人都应率领自己的部落兵参战。再加上前面提过打先锋的契丹、奚、靺鞨,唐军堪称多民族混合部队。

讨伐薛延陀:贞观二十年(646),唐出击薛延陀,“太宗遣使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道安抚大使,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领突厥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各统所部兵,分道并进。太宗亲幸灵州,为诸军声援”。^{[10]卷 199 下}文中明言执失思力率领的是突厥兵,契苾何力统领的是“本部兵”,那么也是降服的突厥部众。阿史那社尔所统军队族属不详,恐怕也是本族军队。

从上述几次重大战役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唐朝因为经略边疆的需要,也为周边各族群、各政权事务所牵引,不断介入到周边事务中去,打破原来的势力格局,重建当地秩序。自身的军队日趋不足使用,除了募兵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归附自己的各部族的武装力量。这种政策在突厥《阙特勤碑》文中同样得到印证:

突厥臣事大唐天子者凡五十年。为大唐天子先征东方之高丽王;次征西方,至于铁门,其间各地悉尊大唐天子而行其国之法度。突厥一般黑民(Karabudun)皆我之国民也。皆言我国安在?我等为何国征伐?我等乃自有其可汗之人民,今我可汗安在?我等所臣事之可汗为谁?彼等既有此悟心,遂起而与大唐天子为敌。^[9]

文中证实了突厥部众曾参与唐讨伐高句丽和西方(具体情况不详)的战争,透露出降唐的东突厥部

众面对越来越多,路途越来越远的征讨命令的厌倦和不满,从侧面反映了唐政府对降服的各部族军队的依赖。

结语

唐代初年平定东突厥之后,在考虑到周边情势的情况下,为争取到更多的军事资源,以应对东突厥灭亡所导致的原有亚洲大陆政治格局的崩溃,重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秩序,采取了在东突厥余众中普遍建立羁縻府州,保留东突厥部落组织,将原本与农耕世界对峙的游牧人群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的政策,以保存并利用其战斗力。随着向各个方向开拓疆域,唐政府在越来越多的族群中设置羁縻府州,以尽可能地消减敌对势力,增强自己的力量。要言之,羁縻府州制的确立,是因日益变化的现实情况而决定的。

[参考文献]

- [1]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2] 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3]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
- [5] 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M]//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 [6] 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 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M]//唐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8]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9]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薛柏成]

Relationship of Ji Mi District System and the Frontier Surroundings in Early Tang Dynasty

SUN Jing-guo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ang Empire established Ji Mi (attached) district system with the intention of using the battle effectiveness of Tu Jue tribes to meet th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surroundings, after it beat the Eastern Tu Jue. Ji Mi district system solved the problem of short of army by providing source of soldiers after it was established.

[Key words] Easter Tu Jue; Ji Mi district system